

# 我寫《他者》

李有成\*



《他者》一書出版於二〇一二年，是我所構思的他者三部曲的第一部。第二部《離散》也已在二〇一三年出版。第三部《記憶》預計明年可以面世。我陸陸續續撰寫這三部曲，前後花了約二十年時間，當然這二十年間我還從事別的研究，也出版了別的著作，只是這三部曲長期深藏在我心裡，揮之不去，希望明年全部出齊後，我可以放下心中的懸念，著手其他的寫作計畫。

這三部曲各書的章節並不是按序次第完成的，而是寫於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場合，最後重新修訂，整理，編輯成書，寫作過程頗為曲折，因此才會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延宕多年，而在最近幾年內陸續出版。這裡只談三部曲的第一部《他者》。

《他者》一書封底有一段我所撰寫的文字，可以簡略統攝全書的重要關懷：

這本書以論證他者的歷史重要性開始，接著分析影像文化與文學中所透露的對他者的恐懼、排拒與迫害。其餘的章節則析論與他者身分密切相關的若干議題，包括全球化、後現代戰爭、跨文化現象等。這本書所處理的文化文本與事證也說明了，環繞著他者的議題雖然古老，但卻並不過時，從《聖經》的故事到今天仍然在我們身邊不時發生的事件可以看出，他者與其相關的文化議題始終盤據著我們的文化想像。作者相信，在一個仍然充滿偏見、無知與仇恨的世界裡，如何面對他者，了解他者，承認他者，悅納他者，視他者為自我的映照，不僅是學術問題，也是倫理問題。

誠然，環繞著他者的議題相當古老，不過在當代歐陸的哲學思考中，他者仍然是個熱門而迫切的議題。正如我在本書的〈緒論〉中所指出的，「早在一九八〇與九〇年代，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就一再析論陌生人的角色；德希達（Jacques Derrida）也反覆討論如何待客，如何悅納異己；列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則以倫理學為其哲學重心，暢論自我對他者的責任；哈貝瑪斯（Jürgen Habermas）更主張要包容他者。這些論述或思想之出現並非偶然，其背後應該有相當實際的現實基礎與倫理關懷。」這裡所說的現實基礎與倫理關懷並非無的放矢，其實涉及歐洲社會近二、三十年來所面對的移民問題。尤其近年來因為經濟不振，失業率高，在束手無策之餘，有些人——特別是政治人物——就開始尋找代罪羔羊，首當其衝的就是各國的客工與移民。各種形式的反移民活動因此時有所聞，各國以反移民為號召的極右翼民族主義政黨與新納粹主義運動也應運而起。反移民所具現的排外恐懼說明了法西斯主義的陰魂仍然潛伏在某些人心中，並未形消於無。歷史血淚斑斑，殷鑑不遠，許多思想家憂心忡忡，因此才會幾乎同時紛紛著書立說，以各種論述嘗試打開困境。

這本書並未從這些思想家的理論說起，理由很簡單。其一是，臺灣學術界對他們的理論並不陌生。以德希達而論，早在二〇〇六年，我與國立清華大學傅士珍教授即為《中外文學》客座主編了一期專號，題為〈論悅納異己〉（第

三十四卷第八期)，其中不少論文都涉及德希達所論的待客之道 (hospitality)。此外，二〇〇七年《中外文學》也推出了由國立成功大學賴俊雄教授所客座主編的〈列維納斯專輯〉(第三十六卷第四期)。其二是，倘若我需要這些思想家在理論上為我鋪路，即使他們的理論已經廣為人知，我恐怕還是會在〈緒論〉中轉述他們的理論的。只不過他們的理論各有重心，需要廣泛協商與疏通，而且未必契合當下我所規劃的議程，我希望我的〈緒論〉能夠以實例說明我的議程的重要性，以及這些議程的政治與倫理意義。因此只有在書中各章節的論證過程中，我偶而會技巧地引述若干西方思想家的觀點作為理論上的佐證。我期望《他者》全書更多的是我自己的想法與發現。

我在〈緒論〉中列舉了幾個大家記憶猶新的實例，特別是二〇〇三年美、英聯軍入侵伊拉克與法國薩科奇 (Nicolas Sarkozy) 政權驅逐境內羅姆人 (the Roma，即俗稱的吉普賽人) 的事件。這些例證背後所透露的是某些人在面對他者時所仰賴的生物政治 (biopolitics) —— 否定他者，圍堵他者，羞辱他者，驅逐他者，甚至終結他者的生命。反諷的是，這樣的生物政治卻是為了創造自己的生存條件 —— 消除他者即是消除對自己生存的威脅。所有的修辭包裝在層層剝開之後，最後只剩下自私的、原始的生存慾望。只是慾望是真的，威脅並不一定。

這樣的論證隱約涉及黑格爾哲學中慾望與承認的問題。用批評家巴特勒 (Judith Butler) 在《脆危生命：傷悼與暴力的力量》(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一書中的話說：「慾望一方面否定他者的他者性 (即：因為他者的結構和我的相似，占據了我的地盤，威脅了我的單一存在)；另一方面則又處於這樣的一個困境：它需要那個他者，又害怕自己成為那個他者，被那個他者所攫取。」換句話說，慾望與承認界定了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係，自我雖然在他者身上看到自己，卻又深感受到威脅，因此必須否定他者，而否定的形式與方法很多，從反移民到入侵伊拉克，比比皆是，只是否定的程度不同而已。為抵拒或反抗對他者的否定，巴特勒因此提到承認的重要性。承認在英、美學術界其實是老議題，從一九九〇年代初泰勒 (Charles Taylor) 闡述承認的政治開始，學術界對這個議題已經有不少的討論；巴特勒則把這個議題進一步帶到另一個面向，要我們承認生命脆危，承認對他者的責任與義務。

以二〇〇三年美、英強權入侵伊拉克，以及這些年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



人的無情屠殺為例，顯然這些好戰的人相信，生命雖然脆危，但是輕重仍然有別：有些人的生命特別脆危，有些人的不那麼脆危；把生命的脆危性放大或縮小，無異於決定何者為可活的生命，何者為不可活的生命。如果我們相信眾生平等，相信生命的珍貴，我們就必須拒絕這樣的想法或理念。不論自我或他者，沒有任何人的生命比其他人的價值較高或者較低。生命需要條件，才能成為可活的生命，而創造與維護這些條件，無疑是我們的政治責任與倫理決定。

《他者》全書粗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四章，總題為「想像他者」。我以《聖經》、電影及文學的若干文本介入，分別論證不同他者的重要性，同時以某些實例勾勒他者的悲劇命運——尤其是許多政治他者與第三世界他者，不幸都被迫必須面對這樣的悲劇命運。第一章刻意重讀《舊約·路得記》(Ruth)，主要是因為我有感於社會上對外籍配偶的歧視與偏見。這些歧視與偏見非僅存在於一般社會與文化之中，也存在於建制性的立法與行政當中。這一章嘗試以嫁入以色列的摩押(Moab)女子路得為例，析論以待客之道悅納他者的重要性。路得以外邦女子的身分嫁以色列人為妻，成為以色列人的母親，竟影響了往後以色列的歷史發展與王權系譜的傳承，以及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分合發展，因為後來一統以色列的《舊約·詩篇》(Psalms)的主要作者大衛王就是路得的曾孫。《新約·馬太福音》有這樣的記載：「由大衛到放逐巴比倫，有十四個世代，由放逐巴比倫到基督，有十四個世代。」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說：沒有外邦女子路得，就不會有大衛，沒有大衛，當然也不會有二十八個世代之後的耶穌基督；換言之，沒有路得，以色列的歷史文化必須改寫，世界宗教歷史也會很不一樣。我的結論是：「能不善待外邦人，尤其是外邦女子？」

第二章主要在反省與批判一九五〇年代美國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麥卡錫主義是冷戰初期美國政治右翼賴以迫害政治他者的意識型態利器，影藝界株連甚廣。麥卡錫主義的時代雖已遠去，但其幽靈仍然潛存在某些人內心見不到陽光的角落，隨時會被召喚顯現。所有貼標籤、扣帽子之類的政治與文化的獵巫行為只是麥卡錫主義的縮影，反映的是社會上某些人的思想怠惰與心靈閉塞。第三章則以科幻電影《異形》(Alien)為例，探討在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之下他者的命運，影片中的異形在某種意義上具現了資本帝國對第三世界他者的覬覦與恐懼。影片顯然在寓意上有意批判資本帝國的貪婪與

無窮慾望，以及此貪婪與慾望背後對他者的焦慮不安。第四章延續上述的議題，試圖以晚近的創傷與傷悼理論析論莫欣·哈密（Mohsin Hamid）的後九一一小說《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中所隱含的政治寓意。這一章旨在描述與檢討美國的帝國本質，批判美國如何挾其強大的軍事與經濟力量，以資本帝國的暴力為第三世界他者帶來苦難與悲劇。

第二部分總題為「跨文化想像」。這一部分共有三章，整個議題轉到與他者身分相關的若干文化問題。第五章接續上一章的討論，分析後現代戰爭何以是虛擬化與電玩化的戰爭，我認為這樣的戰爭是「場面多於資訊、擬做多於真實、擬像多於指涉」，因此在晚近的戰爭中死傷的平民百姓竟彷彿淪為「隱形的他者」，既看不見敵人，甚至也不知傷亡從何而來。第六章延續第五章的議題，以夾敘夾議的方式論證文化帝國主義所造成的文化同質化的危機，以及本土文化對此現象可能的抗拒與修正。最後一章則把上一章的討論推向跨國文化研究的問題。我在這一章裡嘗試以性質與形貌互異的兩個文化文本——李安的《臥虎藏龍》與非裔美國人的饒舌歌曲——析論跨文化轉向如何改變與改造文化生產。在全球流動的脈絡下，我們顯然急需「活潑開放地描述文化的新視野與新方法」。跨文化的了解與研究因此相當重要。

在我的構思中，《他者》應該是一部饒富省思與批判性的書，我的主要指涉是文學與文化，全書的論證清楚反映了我的學術信念，那就是文學與文化研究的淑世功能。我希望透過對某些文學與文化文本的分析，對若干文學與文化議題的論證，思考他者的角色與跨國資本主義下跟他者文化相關的問題。當然我也希望我的思考能夠扣緊當代的歷史現實。就這一點而論，《他者》的寫作其實是出於日本中國思想史學者溝口雄三所說的亞洲感情的。溝口指的是那種「期盼能夠擺脫歧視和偏見以獲取自由的人類的共同心理，那種要在人世間消除壓迫與被壓迫結構的決心」。《他者》如果有任何政治議程，這個議程倒是與溝口所說的亞洲感情若合符節的。就現實面而言，就像我在〈自序〉中所指出的，「我們的社會對亞洲——至少一大部分的亞洲——是存有偏見的，因此對來自亞洲某些國家的外籍配偶與外籍勞工的歧視與剝削時有所聞。這些歧視與剝削甚至構成了人權問題，除了少數學者關心之外，我們的政治社會似乎並不以為意。同為亞洲人，我們對伊拉克與阿富汗人民在帝國強權下的遭遇也視若無睹，從來不發一語。」就這一點來說，《他者》一書的部分議程——特別是第一部分——其實是對這些現象的間接回應。簡單



言之，這本書有意通過自我與他者的關係從根本釐清問題的癥結。再用我在〈自序〉中的話說，我的想法是這樣的：「一個過度膨脹的自我往往只看到自己而無法正視他者的存在。」小至個人，大至大國強權，莫不如此。在這種情形之下，「他者變得無足輕重，甚至可以犧牲」。

我們對他者和他者的文化其實都肩負著倫理責任，而這些責任可以說源於眾生平等的理念。在結束《離散》一書時，我說：「學術其實也可以多一些悲憫與包容。」這也正是《他者》一書背後隱然若現的重要關懷。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於南港